

王国维的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之关系

彭玉平*

【摘要】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姜夔、周邦彦、吴文英的批评,与其建构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的境界说密切相关。但王国维的这一初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史中,被朱光潜、唐圭璋等为代表的学者所忽略,而吴征铸则是少数能从清代词学的发展轨迹来体察其用心的学者之一。王国维的词学从破晚清模拟、雕琢的词风中建立起来,故极具反叛性,这种反叛特性与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不谋而合,王国维因此而在新文学中被视为重要的奠基人物。他的创作也大体呼应着理论,用普泛性的哲学之思与五代北宋词的自然神妙相结合,开创出填词之新途。其价值值得充分估量。

【关键词】 王国维;姜夔;周邦彦;吴文英;晚清词风;新文化运动

王国维《人间词话》虽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说是在梳理词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在审察词史过程中,对词人的取舍、褒贬也在不同角度和程度上呼应着相关理论。譬如“隔与不隔”等理论,就是与对具体词人的品评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间词话》学术史中,有不少学者即关注到王国维对部分词人的品评,并以此构成这一时期学术史的一个亮点。同时对词人的品评,意味着王国维对词史的取舍态度,其中姜夔、周邦彦和吴文英是受到关注较多的词人,而对姜夔、吴文英的批评更多地指涉清代词史——尤其是晚清词坛。所以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的关系,也是勘察《人间词话》时值得重视的一个视角。

一、理论漩涡中的三大词人:姜夔、周邦彦、吴文英

一部《人间词话》,涉及词人众多,有些是作为词史之一部分而不能不有所提及;有些则是出于印证理论的需要。姜夔、周邦彦和吴文英便是属于后一类。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隔与不隔”理论的分析一时成为热潮,在王国维语境中作为“隔”的代表姜夔便受到了格外关注。在《人间词话》中,姜夔基本上是以反面人物出现,除了在学报

* 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510275。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11FZW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史”(10&ZD102)的中期成果。

本^①第31则中评价姜夔略有词中比较少的“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的气象外，大都笔带批评。如第36则批评姜夔《惜红衣》二词未得所咏之物之神理，有“隔雾看花”之恨；第38则评其《暗香》、《疏影》“格调虽高，无一语道着”；第39则评价其《扬州慢》、《点绛唇》二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第42则云：“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第42则评姜夔“有格而无情”；第45则评姜夔其人“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第46则评姜夔为人“不失为狷”。将这些评论综合起来，大体可以归为四点：第一，姜夔词有格调，甚至可以称为格韵高绝；第二，姜夔词具备其他词人很少具备的“韵趣高奇”、“嵯峨萧瑟”之气象；第三，姜夔的词在总体上是“隔”的代表，写景状物流于模糊影响；第四，姜夔人品低下。至于姜夔为何人品低下却能创作出格韵高绝的作品？王国维没有正面回答。王国维对姜夔的批评可以用“犀利”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所尖锐抨击的姜夔恰恰是自清初朱彝尊以来即备加称誉的人物，王国维词学的反叛性格即从其评论姜夔一端，也可见出端倪。但这种激烈行为也注定要受到此后学者的质疑。在三四十年代的研究史中，对王国维此点的批评占据着绝对的主流。

情趣与意象的关系是朱光潜评判王国维词学的重要立足点，他从这两者的关系得出诗歌具有隐和显的区别，所以对于王国维提出“隔”的概念不以为然。他认为“隔”其实是“隐”，而隐是诗歌抒情所宜讲究的，所以对于王国维批评姜夔的“如雾里看花”持不同意见。他说：“写景不宜隐，隐易流于晦；写情不宜显，显易流于浅。”^②朱光潜的划分自然简单了些，因为诗词中的写景言情本自难分，也非简单的隐、显可限，但在一篇当中，写景和言情确有侧重。朱光潜

既然批评王国维对隔的解释不很妥当，自然对其有关姜夔的批评很难苟同了。

唐圭璋对于王国维的批评几乎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批评其重视境界而忽略情韵，专尚赋体而轻视比兴，即对其境界说之地位，也认为与前此如兴趣、神韵诸说相仿佛，不过话语不同而已。唐圭璋《评〈人间词话〉》一文中，涉及对王国维评论姜夔观点的评议的篇幅，超过全文的三分之一以上，可见其用力所在。唐圭璋说：“白石天籁、人力，两臻绝顶。所写景物，往往遗貌取神，体会入微。而王氏以隔少之，殊为皮相。”唐圭璋将王国维揭出批评的《扬州慢》、《点绛唇》、《惜红衣》之句，反视为“极细极妙”、“笔墨极灵动”、“妙语妙境”。而对于王国维认为姜夔不致力于意境之锻造，从而导致缺乏言外之意、弦外之响，唐圭璋更是极力反对，他说：“白石以健笔写柔情，出语峭拔俊逸，格既高，情亦深，其胜处在神不在貌，最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③唐圭璋并具体分析了《暗香》、《疏影》二词是如何在写梅花之外而暗忆君国的。如此说来，唐圭璋将王国维对于姜夔的贬评几乎全部作了颠覆，认为其格高情深，饶有韵味，其深刻细腻之描写不仅没有造成“隔”的阅读效果，反而增添特殊的艺术魅力。

吴征铸的《评〈人间词话〉》在朱光潜、唐圭璋二文的基础上，对于王国维强分隔与不隔并以此厚五代北宋而薄南宋表达了不满。在吴征铸看来，不隔是一种美，而隔是另外一种美，二美各具特性，不可偏废。吴征铸说：“既以境界为主，则不当以隔与不隔为优劣之分。何则？雾里看花，倘花之美为雾所隔，则此隔诚足为病矣。今以常理言，花在雾中，颜色姿态各呈特异之观，雾之于花，不似屏障之于几案，截然为二物，盖早已融成一片，共现一冲和静穆之境。此境之美，无待言也。”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

^①所谓“学报本”，即王国维在1908—1909年之交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本文引用学报本皆出自王国维著、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以下不再一一标明。

^②朱光潜：《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86页。

^③唐圭璋：《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94、95页。

吴征铸对于王国维批评姜夔“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的“隔”不予认同。他说：“数峰立于黄昏雨中，此犹花之本质也。加上‘清苦’、‘商略’等形容词，此犹花上有雾，读者于此两句，不觉其雕饰，反觉其浑融。又何伤于隔乎？”^①吴征铸对姜夔的翻案明显受到朱光潜、唐圭璋的影响，只是厘析得更为具体了。

当然对于王国维贬低姜夔及其词的做法，也不乏支持者。胡适对于词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及词体特性和词人的定位，与王国维都颇为一致。胡适的《词选》选录姜夔词9首，但从宋末即备享盛誉的《扬州慢》、《点绛唇》、《暗香》、《疏影》、《惜红衣》等均被黜落在外，而一些词风清朗的词如《念奴娇》（闹红一舸）、《湘月》（五湖旧约）等则赫然在列，这种一出一入，已可见其对王国维学说的主动接应了。在姜夔名下的小序中，胡适更有一番对姜夔词的评述，其中即有着王国维的影子。胡适说：“他的词长于音调的谐婉，但往往因音节而牺牲内容；有些词读起来很可听，而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而对于姜夔的《暗香》、《疏影》二词，胡适的评价一如王国维，他说：“这两首词只是用了几个梅花的古典，毫无新意可取，《疏影》一首更劣下。”^②胡适在序论中虽然也提到姜夔的《扬州慢》、《凄凉犯》等词，但他的评价是词本身不如词前小序，这评价确乎有些离奇，但总是奚落白石的意思，自是再明显不过了。

大概因为王国维建构境界说的基本理论，大都没有涉及到周邦彦，所以在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与对王国维评姜夔的关注相比，对王国维评论周邦彦的关注明显要冷清不少。但因为在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周邦彦一直是广受恩宠的人物，特别是自周济以还，大都奉周邦彦之“浑化”为词之极则，所以王国维的批评自然会在这种膜拜声中显得夺目起来。综合《人间词话》对清真的评述，总体上认为其可入第一流词

人之列，原因有二：第一，善于“言情体物”，能得所咏之物之神理；第二，多创调之才。但其不足主要有三：第一，多作艳词而乏品格，类娼妓之语；第二，创意之才少，故其词作乏深远之致；第三，多用替代字，意不足而语不妙。以上是从《国粹学报》发表本中概括而来的评论要点，如果结合后来赵万里刊登在《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上的《人间词话》未刊稿的有关条目，则王国维对于清真之长调推许亦甚力，并将其纳入“词之最工者”之列。而在稍后完成的《清真先生遗事》中更将前期对清真之非议删削殆尽，称其为“词中老杜”。这一番前后的否定之否定，当然意味着王国维词学的自我调整。戚法仁《人间词话补笺序》云：“至于《清真》一集，极沉郁顿挫之观，两宋之世，一人而已。王氏少之。及后更著《清真先生遗事》，乃尽反前说，殆亦悔其少作。”^③就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前后的态度差别。唐圭璋详细分析了王国维评论姜夔的“皮相”之处，对于周邦彦，只有一句“论周柳之处，亦不平允”^④。至于如何不平允及不平允的原因则不遑深论。李敦勤曾撰文专论王国维的评论内涵，然不过列举其观点，略加评说而已。对王国维评论其体物之功以及后来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将周邦彦拟之于“词中老杜”表示充分认同，但对其贬斥清真人品，则引述《白雨斋词话》以及王国维前后期相关论述的矛盾，表达了怀疑和批评。^⑤不过在解放后，这个话题就逐渐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了。

吴文英是王国维批评最力的词人，早在托名樊志厚作的《人间词甲稿序》和《人间词乙稿序》中即自称“尤痛诋梦窗”，认为其好雕琢砌字，专事摹拟，流于浅薄，是“六百年来词之不振”的开端。而在《人间词话》中，吴文英几乎成为王国维立论的主要对立面。约而言之，王国维认为梦窗词之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①吴征铸：《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96—97页。

②胡适选注：《词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③王静安先生著，靳德峻笺证，蒲菁补笺：《人间词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

④唐圭璋：《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95页。

⑤李敦勤：《王静安论周美成词》，《中央日报》1948年6月5日。

面:一、多用代字,意不足语不妙;二、写景之作多病于隔;三、“映梦窗零乱碧”,雕琢过甚,辞采过繁;四、才分有限,失之肤浅。这些要点当然只是从其词话中摘录出来,总体而言,与王国维所推崇之自然真实、情景无碍、不隔而深的境界之说相距甚远。吴文英词的这些特点当然是王国维予以严厉批评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吴文英是“近人”师法的主要对象,由于梦窗词风的盛行,当时许多词人不仅看不到北宋词的佳妙,而且将南宋以吴文英为代表的词作为词之极境而顶礼膜拜。所以从纠正时代风气的角度而言,王国维也不能不将吴文英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

王国维对吴文英近乎苛刻的批评,得到了稍后同样欲转变当代文学风向的胡适的支持。胡适说:“《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①。这个评价带着情绪,是一眼可以看出的。任访秋在比较王国维与胡适两人观点的相似后亦云:“他们二人对梦窗所以如此攻击的原因,大概第一,因为他是南宋专重音律而放弃内容的词人的代表。欲攻击这一派,那么擒贼先擒王,自然不能不首先的攻击他。第二,又因为他是近世词家模拟之祖,欲破除一般人谬误之见地,亦不得不攻击他。梦窗本不是众矢之的,其所以如此者,大半是受了近世模仿者的连累之故。”^②任访秋的这个总结堪称准确到位,反观王国维与胡适倒未必能意识到其批评过甚其辞的地方了。

唐圭璋主张天籁、人力各擅其美,北宋、南宋只是在美的形态上有差别,而非美的程度上有轩轻,所以他说:“至南宋诸家,如梦窗、梅溪、

草窗、玉田、碧山,各有其精诣独到之处,亦何能一概抹煞?”^③这是一种概括式的评论,但态度是鲜明的。不过,唐圭璋的这种评断只是针对梦窗等人的词本身而言的,而王国维不仅针对梦窗词,更针对近人的摹拟梦窗词的风气而言的。与任访秋观点近似,吴征铸从清代词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待王国维对梦窗词的贬斥,认为其中有着深沉的时代原因。虽然整个清代对南宋词的推崇几乎一以贯之,但浙派尚醇雅,常派主寄托,其偏尚南宋之词尚自具学理,而“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提倡梦窗,推为极则”,则不免偏嗜过甚了。结果“学梦窗者,流于晦涩”,并形成了整个晚清时期以堆垛故实、装点字面为特征的一代词风,所以王国维以“境界说”力纠其弊。吴征铸对王国维批评梦窗词的理解显然要更具知人论世的理论深度。当然,吴征铸对于王国维的矫枉过正也不讳言,认为其对梦窗等人词的带有情绪化的恶评,也偏离了正常学理的轨道,不无“救世之意,反足以误世”的可能。^④救世也好,误世也罢,《人间词话》与晚清词风的关系确实是不能讳言的,这也就不能不言及王国维词学与后来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之关系了。

二、从王国维对晚清词风之批评看其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王国维早年专研德国古典、近代哲学,其用意在于进行思想革命^⑤,欲在“世论益歧”的当代“拯此横流”^⑥,所以革命的意识原本就一直存留在王国维的思想深处。他的《叔本华与尼采》一文曾比较两人的异同说:“……叔本华说

①胡适:《词选》,第296、297页。

②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81页。

③唐圭璋:《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95页。

④参见吴征铸:《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99页。

⑤刘蕙孙:《关于〈殷虚书契考释〉成书经过的回忆》云:“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学部图书局时,最初是研究西洋哲学,翻译了尼采的《超人》,出版了《静安文集》。据罗说,他当时是要革中国思想的命。此道不通,又学南唐二主的词、吴梅村的诗,写了《人间词话》。”《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3年第2期。

⑥罗振玉:《海宁王忠惠公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9页。

涅槃,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①王国维希望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学说中,寻找出创造新文化的路径,这是其明确的方向。不过在经历了数年的钻研,特别是由尼采、叔本华而上溯至康德之后,其以悲观及悲观的解脱之道为基本内涵的哲学思想,并未引起王国维极大的共鸣,反而参杂了不少失望的情绪。正是因为这种失望情绪的滋衍,王国维将自己的兴趣转向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以寻求直接之慰藉,而词便是他选择的第一个文学领域。在发表了《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之后,接着便是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撰述《词录》,然后便转入《人间词话》的撰写。创作、文献、理论便构成了王国维词学的三大板块,而理论对于其自身创作和文献辑录的提升,乃是显见的事实。

王国维的文学观念因为有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基础,而叔本华、尼采哲学又特别重视文学美学的作用和意义,所以其未竟其业的思想革命便不可避免地部分地在文学领域表现出来。王国维早年完成的《静安文集》,其中便夹杂着对新文学的憧憬。周光午就认为,王国维如果不是中年以后致力于传统经史考证之学,“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属于王国维的,因为其“持论之伟,盖为五四运动诸公之先知先觉”^②。王国维推崇纯文学,主张自然的美学观,即与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脉息相通,也正与10多年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不谋而合,所以后来研究《人间词话》的学者,有不少即注意到王国维在这方面的先导意义。

吴文祺应该是最早认识到王国维作为文学

革命先驱者的事实身份的。1924年他特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一文,来阐明他的这一看法。他注意到王国维如下几点迥异于时代的文学观念:第一,在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中,特别重视小说戏曲的价值,并予以精密的研究;第二,在科学至上的时代,呼唤重视文学,重视描写人生;第三,推崇自然的文学观念。而对照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吴文祺又说:“近年来的新文学运动,只是一种解除文学上的一切镣铐枷锁的运动,只是一种出文学于做作的牢笼而复返于自然的运动。”^③而“王静庵先生二十年——或十余年——前的文学见解,竟和二十年——或十余年——后的新文学家不谋而合”^④,这已足以证明其在文学革命理念上的先知先觉了。吴文祺这一番分析当然很有说服力,只是其论证范围基本限于王国维的小说、戏曲研究,并未涉及到词体,通篇也未提及《人间词话》一书,这可能与当时《人间词话》尚沉睡在《国粹学报》中有关。1926年初,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由朴社单行出版,这才慢慢进入到当时的学术视野。

系统地考量《人间词话》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当属任访秋。在30年代初,任访秋撰《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详细对勘两人两书的异同。任访秋说:“王先生为逊清之遗老,而胡先生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导,但就彼二人对文学之见地言之,竟有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处,不能说不是一件极耐人寻味的事。”^⑤任访秋这篇长文从两人对词体的解释——包括词史分期和文体演变的公式、对南北宋词的抑扬态度、对词人的具体品评——主要以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吴文英等为例、境界与意境的批评标准、对咏物词的态度、出版后的影响等六个方面

①《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90页。当然王国维之从事哲学也有其个人原因,其《自序》云:“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则王国维研究哲学除了有创建新文化之意愿之外,也有通过学习哲学来解脱个人在身体和性格上对人生的困惑在内。参见《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9页。

②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原刊《重庆清华》第四期,1947年4月。转引自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58、160页。

③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何志超主编:《人间词话研究汇编》,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年,第370页。

④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人间词话研究汇编》,第383-384页。

⑤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73页。

逐一比较其异同——尤其是同的方面。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相同的地方，即批评的倾向还算一致，即比较重内容而轻格律。这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新的趋向。但王先生在十年前即有此见解，竟能与十年后新文学之倡导者胡先生见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们钦佩他的识见卓绝了。（吴文祺君称王先生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信哉斯言！）”^①这煞尾的一句，其实正透露出任访秋撰述此文的动机主要即在梳理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胡适《词选》在精神上的影响，是对吴文祺文章言文学革命而未及词学的一种补证。许文雨也将王国维与后来的“新文学家”等量齐观。他说：“王氏晚年虽以文字学、史学名海内，而早年则治纯文学甚笃。其文学见地最新颖，为今人所乐崇。……论文学境界，则以不隔为佳。内容不隔，则行文自然，二者实相因也。其评论元曲使用俗字，即是使用新言语，极符合于自然之义。……是其求文学上之解放，实不亚于今之自命为新文学家。”^②

朱光潜、唐圭璋致力于对《人间词话》的批评，对其价值未遑充分考量，所以就更谈不上其对文学革命的贡献了。吴征铸虽然也侧重在批评其偏颇，但能意识到这种偏颇的形成正是出于急切的救世目的；换言之，对王国维在词学领域的“革命”意识，吴征铸是充分认同的。吴征铸鉴于王国维论词史厚五代北宋而薄南宋的倾向，结合明清词史的发展实际说：“推原静安先生之严屏南宋，盖亦有其苦心。词自明代中衰以后，至清而复兴。清初朱（竹垞）、厉（樊榭）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提倡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也。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词风，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于铜墙铁壁，密不通风。静安先生目

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为主之说以廓清之，此乃对症下药之论也。”^③吴征铸的这一番分析兼具历史观念和理论内涵，较之吴文祺和任访秋，显然更具学理深度，也更契合词体实际。

不过，吴征铸认同其革命的观念，却不认同其以一种偏颇来纠正另一种偏颇的革命方向。吴征铸说：“文学之事，最不宜有执一之谈。博采众长，转益多师，能入能止，始可成一家之面目。若夫崖岸过高，反生阴影。明世何、李，高唱文必两汉、诗必盛唐之说。两汉、盛唐非不佳也，究之七子之诗，乃为高腔大调，面目则是，精神全非。当不如宋元人所作，虽非唐音，尚成一体也。铸恐读《人间词话》者，狃于词必五代北宋之说，学步邯郸，不敢稍越，终乃满纸斜阳芳草，秋月春风，自许境界甚高，实皆陈言习套。静安先生救世之意，反足以误世矣”；“吾欲为先生进一解曰：词以境界为主，但不以隔不隔分优劣。五代两宋词，各有不同之境界，学者各就性之所近以师之可也”^④。据实而言，吴征铸对于王国维过执五代北宋之“境界”所带来的“崖岸过高，反生阴影”的担忧，是极具前瞻性的。其参诸明代前、后七子之教训，也极有说服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类似这样既具充足的理性分析又具丰满的学理判断，不说是空谷足音，起码是颇为寂寥的。

三、词人取舍与词风变革方向

王国维《人间词话》在词人取舍方面的爱憎分明，是稍检其书者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他对李煜、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等的欣赏情见乎辞，而对南宋词人如张炎、吴文英、史达祖等的厌恶也是直陈笔端。所以，《人间词话》的情感色彩确实昭然在目。不过，王国维褒扬北宋也好，批评南宋也好，其宗旨并非简单地恢复北宋

^①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46页。

^②许文雨：《文论讲疏·王国维元剧之文章》，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第522页。

^③吴征铸：《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99页。

^④吴征铸：《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99页。

词的神韵,此观王国维假托樊志厚之名而作的《人间词》甲、乙稿两序即可明了。《人间词甲稿序》云:

……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力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也,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

《人间词乙稿序》亦云:

……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所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

窃以为这两序之结尾,是王国维“曲终奏雅”之所在,值得仔细玩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五代北宋词的赞誉是极其鲜明的,所以其词学取向也很容易被误解为以复古为基调。但细绎其语,王国维的取法五代北宋,仅是为了宏扬其中的“意境”,而非仅在以小令为主体的“体裁”上,所以王国维“不任受”把自己的词看作是对五代北宋词的简单复古,因为简单的复古本质上就是“专事摹拟”,这与他深相诟薄的南宋词在创作方法上就无二致了。简言之,南宋人所失在“专事摹拟”,如果在晚清再复古五代北宋,则其实不过是重蹈南宋之“覆辙”。王国维当然不会愿意在反摹拟的口号中自己却走向摹拟,这才是王国维不任受把他的词简单比拟为五代北宋词的深沉原因所在。这同样也是王国维在两篇序言中一再强调自己的填词成就更多得之于天的原因所在,以此与靠人力、善摹拟的词人相区别。

王国维所谓“得之于天”云云,看上去或有

英雄欺人之嫌,其实也是渊源有自。从理论上说,叔本华所持“知力的贵族主义”,注定了其在美学思想上会菲薄“谦逊”之德。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曾引述叔本华语云:

人之观物之浅深明暗之度不一,故诗人之阶级亦不一。当其描写所观也,人人殆自以为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何则?彼于大诗人之诗中,不见其所描写者或逾于自己。非大诗人之诗果然也,彼之肉眼之所及实止于此,故其观美术也,亦如其观自然,不能越此一步也。惟大诗人见他人之见解之肤浅,而此外尚多描写之余地,始知己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而言人之所不能言,故彼之著作,不足以悦时人,祇以自赏而已。若以谦逊为教,则将并其自赏者而亦夺之乎?①

叔本华自己当然是以天才自许的,但他也是从古代之诗人如 Horace、Lucretius、Ovid、Dante、Shakespeare 等人的自述中“莫不有矜贵之色”而总结出来的,“故大人而不自见其大者,殆未之有。惟细人者,自顾其一生之空无所有,而聊托于谦逊以自慰”②。叔本华的理论语境在这里。而王国维特地援引叔本华的这一节话,则不仅为其自信甚至自负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而且其以观物深浅明暗来分第诗人之阶级,实际上昭示出“大诗人”、“大人”的锐识与“能言”非一般诗人可及,所以大诗人有足够的理由“自赏”。如此,我们读到王国维诸如“镜里朱颜犹未歇。不辞自媚朝和夕”(《蝶恋花》)、“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虞美人》)等,就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因着上面的理论,王国维对自己在填词方面的成就就不“以谦逊为教”了。他在《自序二》中说:

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

①《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87-88页。

②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88页。

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①

王国维大概意识到自己对词境的开拓“不足以悦时人”,唯有自赏而已,所以出语无忌。王国维的词在当时除了得到周边友人如罗振常、樊炳清等人赏识之外,主流词学界似乎集体冷落了他。宣统年间,虽然因着吴昌绶的从中斡旋,而得到了朱祖谋一句“颇有疏荡之致”的评价^②,但总体是缺乏知音的,王国维的自赏根源于此。

那么,王国维赖以自信的依据究竟在哪里呢?何以几乎整体否定南宋以还的词人?又何以说自己与五代北宋之词人互有不相及之处?从整体上否定南宋以来的词人,当然根于其模拟、雕琢的习气。而王国维不及五代北宋的地方,当在境界上。因为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正在“境界”二字,既是“独绝”,自是难以为继。境界的要素不外自然、真切、深沉、韵味四者^③,此看似至简,其实至难,王国维也不免自叹难以企及。这从其评价朱祖谋虽然从“学人之词”的角度来说堪称“极则”,但对于“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④,可见其心志所在。

然而,王国维的词何尝不属于学人之词的范围?何以同为学人之词,王国维对朱祖谋等人词贬抑如此,而对自己的词却自负若此?从创作一端来看,王国维的词往往是他词论的实践,因此与当时词风殊途而异趋,呈现出独特的个人风貌。顾随认为,在晚清民初的词人中,王国维词“与同时诸老旗帜特异,蹊径殊别,卓然名家,自是不朽之作”^⑤。王国维是真正把词的地位抬高到诗那样古典贵族的,成就了一种“寂

寞的境界”^⑥,以一种变革当代词风的代表视之。缪钺也说:“近人喜言新诗,诗之新不仅在形式,而尤重内容,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⑦数十年后,缪钺再次撰文,认为王国维的诗词有两个特点:“第一,其诗词不囿于当时的风气,而能特立独行,自辟蹊径。第二,诗词中多抒发哲理,而能融化于幽美的形象之中,清邃隽永,耐人寻味,这是自古以来诗人所不易做到的。”^⑧1930年代初,陈乃文编辑《静安词》,也在序中直接以“文学革命巨子”称呼王国维,则对于王国维在诗词创作上所开创之新风气,自是高度认同的。

换言之,王国维在填词方面的“革命”更多地表现在内容上,即在一定程度上以普泛性的人生哲思代替了个性化的情感思绪,也就是缪钺所言“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⑨。这与当时词坛蹊径殊别,也为当时带着沉沉暮气的词坛开辟了新途。而且王国维诗词中的哲理并非如“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而是如“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⑩。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言:“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⑪王国维一向是以大诗人自任的,所以他当然要做一个“自见其大”的“大人”,因为他的词致力于开掘词家未有之境,力争“第一义”,他追问追思的正是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这意味着王国维不会满足在词中表现“个人之事实”,而是以从中“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为己任。这正是他自感可以独步词史的地方。

①《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2页。

②此为吴昌绶致王国维信转述朱祖谋语,参见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③参见王国维著、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页。

④此为王国维手稿文字,参见彭玉平撰:《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6页。

⑤顾随:《〈静安词〉扉页题记》,《顾随:诗文丛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⑥参见顾随:《从静安词〈浣溪沙〉(天末同云)说起》,《顾随:诗文丛论》,第78-80页。

⑦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缪钺:《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⑧缪钺:《王国维诗词述论》,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30页。

⑨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诗词散论》,第110页。

⑩参见《人间词话疏证》,第335页。

⑪《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76页。

明乎王国维在填词方面的拓展路径,我们不仅对其在语言上流露出来的自负多了一份理解,更对其变革当代词风的企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王国维无力追赶五代北宋词人“自然神妙”的艺术境界,所以面对沈曾植对其词“重光再世”之誉,他其实十分冷静,自言其词并无其他佳处,“不过蹊径与人异耳”^①。他在“学人之词”的范围内有意在内容上开掘带有普泛性的

人生哲学之思,将他的哲学思考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词坛的新局面,其贡献自然值得充分估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能敏锐地注意到王国维词学的“新变”因素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堪称是直截本原之论。

(责任编辑:陆 林)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Guowei's Criticism on *Ci* Poets and Trends in *Ci* Poetry Cre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ENG Yu-ping

Abstract: Wang Guowei commented much on such *ci* poets in his *Ren Jian Ci Hua* (Poetic Remarks in the Human World) as Jiang Kui, Zhou Bangyan and Wu Wengying. Wang's criticism of these poet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artistic conception of *ci* poetry, which regards work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the model of *ci* poetry. Bu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Wang was ignored by most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Zhu Guangqian and Tang Guizhang in the 1930s and 1940s. However, Wu Zhengzhu was one of the minorities who tried to understand Wang's purpose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Guowei's theory intends to divert the creation of *ci* poems from deliberate simulation and decoration, hence being revolutionary in this sense. His revolutionary ideas are actual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theories proposed by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Hu Shi. Therefore, Wang was regarded as a pioneer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In addition, his literary practice is basically in line with his theory, which connects the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with the natural taste and spirit embodied by the *ci* poet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explores a new approach to *ci* poetry creation. Wang's contribution thus requires understanding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Wang Guowei; Jiang Kui; Zhou Bangyan; Wu Wengying; trends in *ci* poet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 Culture Movement

^①参见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416页。